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曲蓝色的悲歌，抑郁、苍凉而美丽。

这是一段情，一泓藏在心窝永远滴不出的泪。

这是超凡的爱，爱的无比苦涩、无比艰难。一个是风靡全球的大音乐家（当年穷困潦倒的音乐青年），全然由悲剧音符筑成的血肉之躯；一个是拥有万贯家私、寡居深宅但对艺术无比倾心的巨富遗孀。

他们俩通过奇妙的音乐相互爱慕，从而世界乐坛上演出了一阙世人传颂的千古绝唱。

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在等你，请翻过这一页；无数浪漫的、悲怆的、如歌如泣、行云流水般的乐章在等你，请翻过这一页。

1855年3月2日，尼古拉一世驾崩。承袭尼古拉王位的是他三十六岁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他的登基并没改变战争的进程，战争还是延续到了1856年3月签订《巴黎和约》^①。这意味着俄国外交政策上的一次惨败。这场败局不仅结束了尼古拉一世一贯奉行的对西欧事务的干涉政策，而且把新沙皇亚历山大的注意力也转向了内政。他开始进行一些短期的改革。他的临时改革措施的确有助消融尼古拉以铁一般的意志强加于俄国知识界头上的冬天。有几年，检查制度稍有放松，秘密警察也不那么猖獗了，越来越多的中层人士，甚至连农民和无产者都感到呼吸舒畅多了。就是在亚历山大二世当朝的这段时期里，柴科夫斯基长大成人，并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

正当塞瓦斯托波尔遭到重重围攻时，彼得^②却在悠闲自得地学习钢琴。此时，他从师于法律学校的音乐教师贝克。在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以前，他父亲伊里亚为了满足儿子的愿望，给他雇了一位私人音乐教师。此人名叫鲁道夫·瓦西里耶维奇·昆丁格，是位声望卓著、学究气十足的音乐教师。上了几个月的课后，伊里亚显然是在儿子的再

① 《巴黎和约》，1853—1856年，俄与英、法、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9月，英、法、撒、土联军打败俄国。1856年3月签订了《巴黎和约》。

② 即柴科夫斯基。

三请求下跑去问昆丁格：如果让彼得专门从事音乐事业是否明智？昆丁格回答说：在俄国，音乐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再说，他看不出彼得有什么过人的音乐天赋，虽然他的即兴演奏能力很强，和声感也不错。毫无疑问，昆丁格看错了。不过，彼得的音乐才能确实展现得很迟缓。从那时起又过了很久，他也未能创作出任何可以称之为具有天才的东西。然而，当时昆丁格的忠告却起了另一决定性的作用：父亲要彼得完成法律学校的学业，以便日后在司法部谋个职位^①。

学校的功课几乎占去了彼得所有的时间，每星期他只有一个上午和两个晚上的闲暇。他乐于把这仅有的一点时间用在听交响音乐会上。但这类演出在彼得堡是罕有的。为了欣赏一流的乐队与歌唱演员的表演，他便常去欣赏意大利歌剧。当时常到彼得堡演出的国际歌星中包括泰姆伯利克^②和勃茜奥^③。然而，一位名叫拉格鲁娃的女高音却给彼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对她在《诺尔玛》^④中饰演的女主角折服得五体投地。当时，他接触管弦乐的唯一途径是研究这些作品的钢琴改编谱。然而，当时改编谱奇缺并且价格昂贵。据莫捷斯特说，柴科夫斯基到二十一

① 昆丁格后来回忆说：柴科夫斯基小时记忆力很强，听觉也很敏锐，有一定的和声天才，但从他学习音乐的三年中进步不大。

② 恩利科·泰姆伯利克(1820—1889)，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③ 安乔莉娜·勃茜奥(1830—1859)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十六岁便在米兰登台献技。

④ 《诺尔玛》，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二幕歌剧。

岁时还不知道贝多芬写过几部交响乐，甚至连舒曼是何许人都不知道。

1855年，伊里亚带着孩子来到了哥哥彼得·彼得洛维奇家。他这个曾当过兵的哥哥已经七十岁了，是个虔诚的教徒，现隐居在家，没完没了地写一些神秘的小册子。可他的老伴青春依在，仍常和孩子们一起嬉闹。她的侄儿们常常愉快地回忆起她那开朗和善的性情。彼得在这儿结识了一个非常怪诞的人。此人叫毕巧黎，是个意大利声乐教师。这个过时的公子哥儿都六七十岁了，还把头发染得乌光锃亮，脸上用脂粉涂得象年轻人一样。柴科夫斯基家的孩子都知道他脑后戴了个头箍，用来绷平脸上的皱纹。莫捷斯特还记得，他曾起劲地盯着毕巧黎的头琢磨，试图发现那头箍的奥秘。

除了罗西尼、贝里尼、唐尼采蒂以及年轻的威尔第^①的歌剧作品外，毕巧黎对其它一切音乐上的成就都不屑一顾。据说他曾为莫扎特和贝多芬感到惋惜。通过与毕巧黎的交往，彼得所喜爱的作曲家除了莫扎特和格林卡外，又增加了梅耶贝尔^②和威尔第。毕巧黎不喜欢莫扎特和格林卡，但彼得不与这位夸夸其谈的意大利人争论，而是在他口若悬河的宏论中专心地汲取着歌剧的精华、演唱技巧、以及其它许多有关歌剧的知识。尽管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异那么大，但

① 裘赛普·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作有歌剧《茶花女》、《弄臣》等。

② 吉亚科莫·梅耶贝尔(1791—1864)，德国作曲家，作有歌剧《恶魔罗勃》、《非洲女》等。

有一段时间他和毕巧黎交往甚密，他甚至试着把费特^①的一首译成意大利文的诗谱成歌曲。后来，这首他自费出版的《夜半》被一向崇尚他的莫捷斯特贬为“空洞的业余习作”。

1858年春，团聚在彼得洛维奇家的柴科夫斯基家族听到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伊里亚的钱财被人骗去了。伊里亚历来轻信他人，但这次上当却带来了令人窘迫和难堪的后果。伊里亚此时已是六十三岁高龄，却不得不重新去谋求职业。幸好没过多久他便被委任为彼得堡工学院的院长，生活才重新走上正轨。

彼得十九岁生日后的第六天，也就是1859年5月13日，从法律学校毕业了。他的成绩在班里名列第十三位。他得到一张可在政府机构里任职的毕业证书。根据他本人的志愿，他被分配到司法部。七个月后，他成了见习书记员，紧接着在1860年2月升为正式书记员。尽管他在与人谈话时有着一种咀嚼文件的毛病（一次他把一份重要文件嚼得稀烂），但他在司法部供职期间的声誉即使算不上出类拔萃，也还是相当不错的。亦值此时，他成了赶时髦的花花公子，把工余时间都花费在对各种时尚的追求上。他成了剧院的常客。最令他赏心悦目的是歌剧、芭蕾舞和法国剧。他还竭力追求那种风流倜傥、玩世不恭的风度。彼得堡的各种社交晚会都格外邀宠他，因为他乐意为大家即兴弹奏华尔兹和波尔卡。总之，他同当时彼得堡的许多纨绔子弟

① 费特(1820—1872)，俄国诗人，“纯艺术派”代表，著有抒情诗歌集《黄昏的火》等。

无甚异样。

1860年11月18日，柴科夫斯基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亚历山德拉(妹妹)嫁给了利·瓦·达维多夫。达维多夫的父亲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新婚夫妇很快便动身去达维多夫在基辅卡缅卡的庄园度蜜月。柴科夫斯基一向很喜欢他的妹妹。这次分别，迫使他只能用信函来同妹妹交流感情。这种兄妹之间的友情一直维系下来。后来，连亚历山德拉的孩子都倍受柴科夫斯基的钟爱；她在乌克兰卡缅卡的庄园也成了他的避难所。亚历山德拉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勒沃维奇同莫捷斯特一样成了柴科夫斯基晚年最亲近的人。柴科夫斯基著名的《“悲怆”交响乐》就是题献给他的。

这段时期，年已二十的柴科夫斯基正徬徨于两种相互矛盾的欲望之中。一方面，他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热衷时尚风雅，崇尚寻欢作乐。这时，他已情窦初开，但关于他早年的艳史没有任何记载。莫捷斯特曾描写过他哥哥这段时期的情况。他所用的语汇强烈地暗示出柴科夫斯基就是在这时开始屈服于自己的同性恋欲望——他本人最终也分享了柴科夫斯基的这种隐私。莫捷斯特写道：“这是一种瑕玷、无用的恶习……是一种对享乐的狂热追求……有时会使人陷入极度的痛苦与绝望……这是一种他生活中不为人们所知的细微末节。”^①同时，同性恋在俄国，尤其是在上层

① 可以认为莫捷斯特了解事情的真相。但他非常敬仰柴科夫斯基，所以在为逝世的哥哥作传时，不愿给人留下话柄。再者，他本人也是同性恋者，因而同柴科夫斯基一样，他也感到有必要掩盖这一为世人所唾弃的癖好。毫无疑问，他早就知道人们的闲话并非捕风捉影，但他拒不给这种闲话以任何口实。——原注

军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然而柴科夫斯基在与莫捷斯特通信时仍谨慎地称它为“那事儿”。柴科夫斯基一生常常为他们之间的这种阴晦隐私所压抑，这也就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不幸。

另一方面，柴科夫斯基在整宿地荡迹于舞厅和一些不体面地方的同时，他希望献身于音乐的信念从未泯灭过，虽然这种信念有时表现得并不那么强烈，但却一直潜匿于他的心底。他认为自己一心一意想成为作曲家的愿望体现着自己“好的一面”。为了珍视自己的这个优点，他常常自觉地刻苦工作，分担家务，并竭力克制自己的轻浮放纵。莫捷斯特在描绘当时摇摆于放荡的公子哥儿和严肃的青年音乐家之间的柴科夫斯基时写道：“人们永远也不会了解他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所经历的令人同情的内心斗争。这倒不是因为他在这一时期的信函甚为稀少，而是由于他本人嫉恨别人窥探他内心精神生活的幽隐。他从不对外人吐露自己内心所经历的痛苦，宁愿独自忍受这种辛楚的磨难。对外界来说，他一向是个恬静、欢快的青年。”

1861年3月，正是劝阻过儿子的伊里亚此刻又重新提起了儿子曾想成为一名音乐家的理想。一次，在晚餐桌上，话题转到了柴科夫斯基的才华上面。父亲对柴科夫斯基说，现在选择音乐专业还为时不晚。一向悲观的柴科夫斯基自知这已经太迟了。他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写道：“他们已经让我当了一名行政职员，尽管我并不称职……同时我将研习通奏低音课程”。他时常揣摩那充满诱惑的前景：即放弃司法部的工作，心无牵累地献身于音乐。使他犹豫

不决的是除了对音乐的酷爱，他并不具备任何从事音乐事业的条件。还没有任何确凿的事例表明他具有音乐天才，何况他目前的经济状况根本不能满足他希望成为一名业余音乐家的开销。因而他决定继续留在司法部供职。

1861年3月3日，经过数年的研究、审议、并且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中做了充分酝酿之后，亚历山大二世在他即位六周年这天签署了《废除俄国农奴制宣言》。这天，一向热衷于国家大事的柴科夫斯基来到了教堂，想看看聚集在那里的人民对所颁布的《宣言》有什么反响。柴科夫斯基的父亲是个农奴主，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也使他领悟到农奴制的罪恶。象俄国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他也一定感到了《宣言》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柴科夫斯基与阿布丁^①之间的友谊愈发密切了，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天天见面。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诗歌。其余的时间，柴科夫斯基经常去拜访耶西波夫一家，在他们家里演戏作乐。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赫恩格劳丝夫人，并说他有点爱上了她的女儿索菲。柴科夫斯基当时曾与几个姑娘邂逅。在他写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类艳遇的看法。有人告诉他，有两个小姐十分钟情于他，他淡漠地说：“这真让我受宠若惊。”他就是这样，从不流露自己对谈话中涉及的两位小姐作何感想。

1861年初夏，伊里亚的一个朋友弗·皮萨列夫向他建议，让柴科夫斯基以译员的身分陪他去西欧进行商业旅行。

① 柴科夫斯基童年时的朋友。

6月，年轻的柴科夫斯基把这个“诱人的梦想”写信告诉了妹妹。但到7月，梦想遂成了现实。转瞬间，他们便到了柏林。当时，到国外旅行对俄国人来说是件新鲜事儿。就在不久以前，俄国公民不经特许是不准随便出国的。柏林并不中他的意，他光顾了一家大咖啡舞厅，还欣赏了奥芬巴赫^①的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此后，他在一封信里无动于衷地写道：“我现在对柏林已经了如指掌了，这里的生活令人厌倦。”他们的下一站是汉堡，他觉得这里比柏林强。他对安特卫普^②、布鲁塞尔、奥斯坦德^③几乎无言赘述，尽管他在奥斯坦德兴奋地见到了奔腾咆哮的大海。

柴科夫斯基由海路赴英国，这是他首次在海上旅行；但是抵达不久便迫不及待地盼着去巴黎，因为在那里他将收到来自俄国的信件。他对伦敦小有兴趣，但这座雾雨连天、日照鲜见的都城使他感到格外压抑。8月初，柴科夫斯基听了二十七岁的女歌唱演员阿黛丽娜·帕蒂^④的音乐会。她三个月前在伦敦主演《梦游女》^⑤，引起了巨大轰动。柴科夫斯基后来写信给父亲伊里亚，说歌唱家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德国、比利时、英国都未能征服柴科夫斯基对祖国的一

① 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指挥家。祖籍德国，本名埃贝斯特(Eberst)，后以出生地——德国城市奥芬巴赫为名。

② 比利时地名。

③ 比利时地名。

④ 阿黛丽娜·帕蒂(1843—1919)，意大利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⑤ 《梦游女》，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的二幕歌剧。

片赤心，但他却不免为古老的巴黎所具有的魅力而折服。他象同时代许多俄国来访者一样，发现这座都市里到处都萦绕着迷人的悦音。在这里逗留的六个星期，是他旅途中最愉快、最令人兴奋的时光。8月中旬过后，他去看了《游吟诗人》^①和《胡格诺教徒》^②的演出。他对珀勒蒂埃大厅（当时的法国歌剧院）并不感到新奇。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虽然上演的剧目都很出色，可这座剧院——也包括巴黎的所有剧院，以及表演水准毫无疑义地比彼得堡的演出逊色得多”。他从不忘记在信里关照两句鼓励小“托里亚”和“莫捷亚”的话^③。这对可爱的双伴儿弟弟当时十一岁。

将要离开巴黎时，柴科夫斯基与同行的老板闹了一次口角。这是由于柴科夫斯基对其老板“实在忍无可忍”。因此，便导致了不欢而散。柴科夫斯基只身回到了彼得堡。10月初，他便和家人欢聚一堂了。自不待言，他把积蓄已久的怀乡之情完全倾注到了小阿纳托里和莫捷斯特身上。尽管他在这次突如其来的国外观光中没有获得多大裨益，但对他的成长却不无影响。他回国后一反既往，决心（这是他一连串的决心之一）弃恶从新，使自己成为一个庄重、高尚的人。他把这次旅行视作是“一件大蠢事”，并对亚历山德拉说：“你知道，我很懦弱，一有钱我便用来寻欢作乐，我也

① 《游吟诗人》：威尔第的四幕歌剧。

② 《胡格诺教徒》：一译《法国清教徒》梅耶贝尔的歌剧。

③ 托里亚，莫捷亚：弟弟“阿纳托里”和“莫捷斯特”的昵称。

知道这非常鄙俗、愚蠢，可我好象天性如此。长此以往，我将会落到何种地步？我能祈望些什么呢？想起来真让人不寒而栗。我明白有朝一日我终将失去冲破生活羁绊的力量，但在此之前，我将竭力去吸吮生活的甘泉。近半个月来，一切都不顺心，工作毫无效率，钱象流水一样到手就没，爱情也一事无成。不过，我相信很快就会时来运转的。又及，我正研习通奏低音课程，进展得很顺利。天晓得？也许三年后你会听到我写的歌剧，吟唱着我的咏叹调。”

柴科夫斯基当时正在俄罗斯皇家音乐协会于米哈依洛夫宫开办的公共课上学习通奏低音课程（同时，他还在学习意大利语）。他的老师是查良巴。^①查良巴是年四十岁，曾从师于当时著名的德国音乐权威阿道夫·伯纳德·马克斯学习和声。因此，他也是按照马克斯的理论来授课的。也许就是在查良巴的班上，柴科夫斯基结识了小提琴家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贝索尔，此人后来成了音乐出版商，出版过两本音乐杂志。贝索尔比柴科夫斯基小三岁，晚于他逝世，曾写过一部有关柴科夫斯基的回忆录。这本书极有益于人们了解柴科夫斯基生活中的各个侧面。1861年12月中旬，柴科夫斯基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郑重其事地写道：“我想，我以前曾告诉过你，我已开始学习音乐理论，并进展颇顺利。你一定同意：以我所具有的不凡天资（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说我在自夸），若不在音乐上碰碰运气的话，未免就有点太愚蠢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我那慵困厌世的秉

①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查良巴(1821—1879)俄国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出身于音乐世家。

性,最终我的惰性将会占上风。但倘若事非如此,我向你保证,我会有所建树的。幸好时犹未晚。”此刻,他又改变了以前对时间的看法。

尼古拉到省里的政府机构去任职了。现在,家里除了父亲只剩下柴科夫斯基和他那对孪生兄弟。这样,柴科夫斯基便更加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照看弟弟们的义务。莫捷斯特在追溯这一时期时写道:“回味起那时的生活,有两件事使我记忆犹新:一是当时‘彼得哥哥’和‘工作’这两个概念在我脑子里毫不矛盾;二是每当我听到欢快、谐谑的音乐时,心中总不免感到:在这些音符的背后常伴匿着一种烦躁、厌倦的情绪。这种情绪总是愈来愈强烈,最后往往占上风。”这是在形容柴科夫斯基当时做音乐课练习时的情形。柴科夫斯基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去研究所能到手的一切乐谱,以便进一步丰富自己对古典与现代音乐的知识。音乐占去了他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难得再有机会象以前那样去喝酒、跳舞、寻欢作乐了。与他交往的朋友也只剩下了阿布丁和阿达莫夫。晚上,他有时同父亲一起上剧院,有时在家里陪他打牌。

1862年,柴科夫斯基获悉司法部比他高一层的机构中将出现一个空缺,而他的背景和经历正符合补缺的条件。因而,他发奋努力,竭力在上司面前表现自己,勤勉地完成令他厌烦已极的公务。他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心血来潮,人们只在他追求音乐和寻欢作乐时目睹过。他在查良巴指导下于前一年的12月完成了和声与通奏低音课程的学习。眼下,似乎音乐可以暂且放一放了。但没过多久便传

来了俄罗斯音协要开办自己的音乐学校的消息。9月初，柴科夫斯基交了入学申请，他被录取了。

彼得堡音乐学院(这不是该院的正式名称,但该院以此名闻于世)是两位精力过人、富有远见卓识的人创办的。一位是当时俄国的女杰海伦娜·芭甫洛芙娜公爵夫人。这位日尔曼女人(她是符腾堡公国的公主)嫁给了保罗一世最小的儿子米哈依·巴甫洛维奇大公。因此,也就成了尼古拉一世的弟媳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婶婶。海伦娜聪慧过人,富于同情心,并且精通音乐。1849年,她在四十二岁时便成了寡妇,身边只有两个女儿。当生活终于允许她去从事所热衷的事业时,她便成了一个年轻人的赞助人和密友,这个年轻人就是彼得堡音乐学院更重要的奠基人安东·鲁宾斯坦。

安东·鲁宾斯坦遇到海伦娜时年方二十二岁。此时,他已是享誉欧洲的钢琴家了。他已在彼得堡上演了他的第一部歌剧《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安东·鲁宾斯坦与公爵夫人一见如故,立刻结下了亲密无隙的友情。后来,这位年轻的犹太人成了公爵夫人在卡缅诺依·奥斯特洛夫别墅的乐队长。卡缅诺依·奥斯特洛夫别墅座落在涅瓦河中央的一个小岛上。安东·鲁宾斯坦后来创作的一首著名室内乐作品就是以这条河中的小岛命名的。他们结识不久便一道赴欧洲旅行,从而招致了人们的各种闲话。至于这些闲话是否有根据就无从知晓了。大约在1856年前后,他们开始筹划成立一个音乐协会。这个协会除了举办音乐会外,还将开设专业音乐课,以提高俄罗斯音乐家低得可怜的音乐

水平。他们邀请了热心于这项事业的人来共商大计。1859年初，俄罗斯音协举办了首次筹备会议。尽管亚历山大二世对任何形式的组织都极不信任，但在海伦娜的规劝下他还是恩准了音协的成立。同年11月，俄罗斯音协举办了首届公开音乐会，伟大的安东·鲁宾斯坦亲自在音乐会上演奏了他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45号）。海伦娜把音协的授课地点安排在米哈依洛夫宫她的家里。柴科夫斯基就是在那里听过查良巴授课。

俄罗斯音协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举办的音乐会倍受褒赞，要求听课的人也络绎不绝。不久，它便需要拥有自己的校舍了。海伦娜又去求助亚历山大二世。这位当政的沙皇一向非常敬慕和信任自己的婶婶，这次他不仅批准了海伦娜的请求，还答应给予资助。1861年初冬，由涅瓦河畔一座豪华的私人宅邸改建而成的彼得堡音乐学院举行了建校典礼，三十二岁的安东·鲁宾斯坦担任了首任院长。学院年轻的教师班子还包括：维尼亚夫斯基^①（二十七岁），西奥多·列斯切蒂斯基（三十二岁），俄国大提琴家兼作曲家卡·达维多夫^②，前莱比锡格万特豪斯乐团首席大提琴家洛马金以及查良巴，此外，学院的每个系都配有称职的教师。无疑，他们是无愧皇恩的。1862年9月20日，彼得堡音乐学院正式开课。在第一期的学员中就有柴科夫斯基。

① 亨利克·维尼亚夫斯基(1835—1880)，波兰小提琴家、作曲家。

② 卡尔·尤里耶维奇·达维多夫(1838—1889)，俄国大提琴家、作曲家，其父是犹太人。

最初，柴科夫斯基随查良巴学习严格的对位法和圣乐调式等乏味课程。使用的是当时普鲁士皇家乐长贝勒曼^①的武断教程。后来，他又加了钢琴和长笛课，还上过几节风琴课。音乐学院开课后的第二天，柴科夫斯基写信告诉亚历山德拉：“迟早我会放弃现在的工作，而去专事音乐。别以为我梦想成为大音乐家……无论我将成为一个著名作曲家，还是一个为生计而奔波的音乐教师都无关疼痒，重要的是我的良心将得到安慰，我将没有理由再去抚才自惜了。当然，直到我坚信自己确乎已成为一名音乐家而不再是书记员时，我才会辞去目前的工作。”他同几年前迥乎不同了，以前的翩翩少年现在成了面黄肌瘦、不修边幅的学生。他越来越少地参加社交活动，最后索性放弃了一切业余娱乐。在司法部里浑浑噩噩地挨过那漫长的工作时间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跑到音乐学院去听课，或者回家做练习。以前的酒肉朋友对他的转变起初感到困惑，继而有些恼怒，最后便不再睬他了。

然而，一个新交的朋友却补偿了旧友的离叛。此人是十七岁的热血青年拉罗什^②，后来成了令人费解的音乐批评家，也是柴科夫斯基最狂热的拥护者之一。当时，拉罗什的音乐素养要比年长他五岁的柴科夫斯基高得多。他在十七岁前就曾写过一首进行曲和一首序曲。他博览群书，通晓好几门外语，他的学识远远高于他同龄人所具备的水准。在一次钢琴课上，柴科夫斯基一见到他就为他那机敏、活泼

① 海因里希·贝勒曼(1832—1903)，德国音乐理论家、作曲家。

② 赫尔曼·阿伏古斯托维奇·拉罗什(1845—1904)，俄国音乐批评家。

的性格所吸引，很快便把他当成了除自己亲人以外的唯一知音。拉罗什似乎一开始便十分有把握地肯定了柴科夫斯基的天才。不言而喻，这是对柴科夫斯基的极大鼓舞，促使他作出了辞去司法部职务的重大抉择。在得不到任何支持的情况下毅然投身于音乐。

正在步步荣升的省官员尼古拉兄长听说柴科夫斯基放弃了司法部的稳固前程时，感到大惑不解。他知道柴科夫斯基十分崇拜格林卡的歌剧《为沙皇献身》，因而便委婉地表示他看不出柴科夫斯基将会成为第二个格林卡。“我也许永远成不了另一个格林卡，”柴科夫斯基回答说，“但有朝一日你终将会为我感到自豪。”后来这两句话都应验了。柴科夫斯基终不能与格林卡相提并论，而他的全家，包括省要员尼古拉以及海军军官伊波利特都的确将他引以为豪。

另一个促使柴科夫斯基作出辞职决定的因素也来自音乐学院。一天下课后，老师把柴科夫斯基叫到一旁，批评他学习不够勤奋，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对他来说尤为可耻，因为他有天才。柴科夫斯基深为这中肯的批评所震慑，从而更加坚定了学习音乐的信念。据拉罗什说，那位老师是查良巴；并说，柴科夫斯基从此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学习，并一直把这种热情保持到了毕业。另一位柴科夫斯基同时代的音乐批评家兼教育家卡什金^①的说法与拉罗什有些出入。他认为勉励柴科夫斯基最大限度地去发挥自己才能的教师不是查良巴，而是安东·鲁宾斯坦本人。

①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卡什金（1839—1920），俄国音乐教育家，批评家。

1863年初，安东·鲁宾斯坦免去了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必修课，从而使他可以全力以赴潜心于理论和作曲课。柴科夫斯基始于1862年底听院长本人主讲作曲课。对安东·鲁宾斯坦，柴科夫斯基一直是非常崇敬的，尽管这种感情受过很多波折。只有安东·鲁宾斯坦亲口说出的赞誉对他才有意义；而一切非难，只要不是来自安东·鲁宾斯坦（或者他自己非难自己）都可以敷衍了事。事实上，这位年长的音乐家在柴科夫斯基眼里就象是上帝的化身。一次，安东·鲁宾斯坦对卡什金说：“柴科夫斯基的学习劲头真让人吃惊。我在一次作曲课上布置他根据一个特定的主题写出多种配合旋律的变奏，并提示说做这种功课不仅是质，量也很重要。我以为他顶多会写出一打变奏。结果大出所料，第二次上课时他给了我二百多种变奏曲式。”

柴科夫斯基的变调和即兴演奏技巧很高，所以人们都乐意找他伴奏。1863年初春，他先后在彼得堡大剧院和马林斯基剧院的公开音乐会上为人伴奏。他还参加了海伦娜宫邸的音乐晚会。他写信给亚历山德拉，说他被春季音乐活动搞得精疲力竭。还告诉她他已铁心献身音乐。此时，他还没有获得他曾为之努力的晋升，因而便以此为由辞去了司法部的职务。也许他期望在音乐学院里得到一个教学的位置。他还在信中说：“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我将成为一名出色的音乐家……所有的老师都对我很满意，并且告诉我，只要勤奋，我前程远大。”柴科夫斯基不久便把他在司法部的工作忘得一干二净了。

从现实的角度看，献身艺术对年方二十三岁的柴科夫